



冬至



贾里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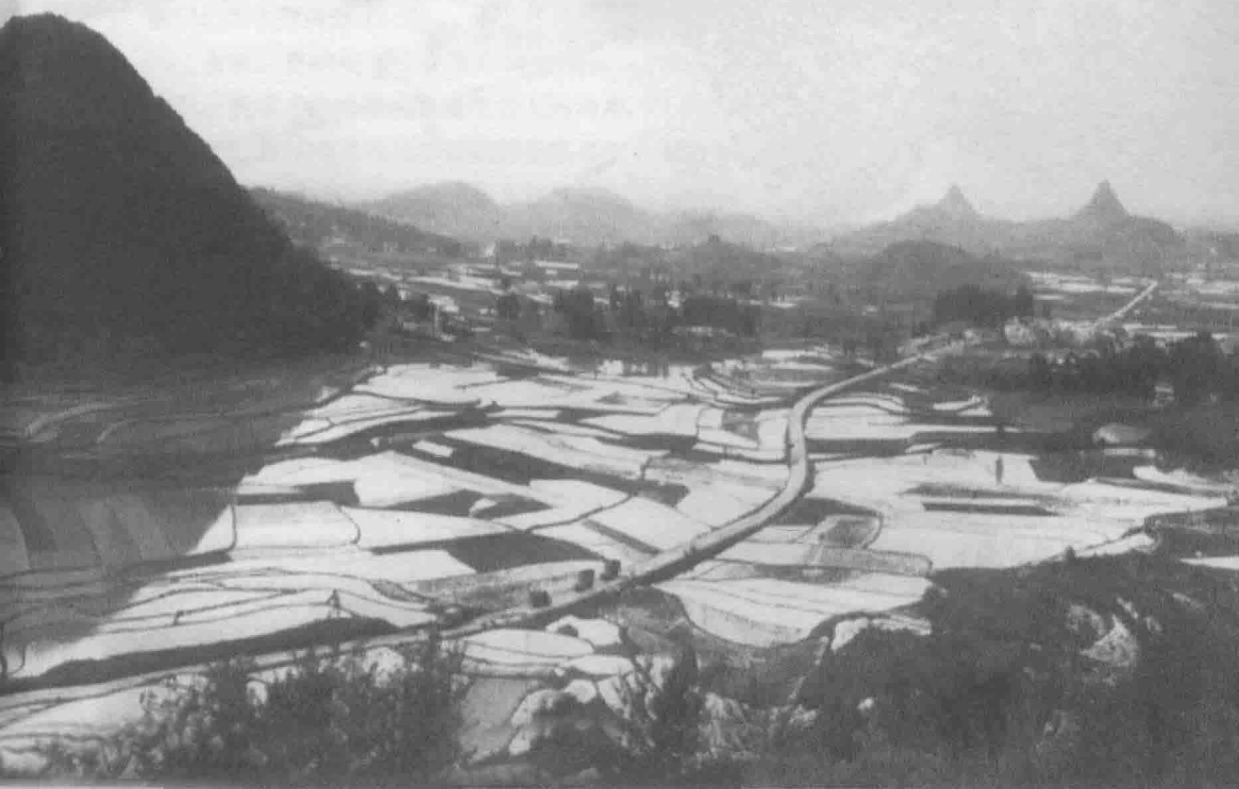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冬至



贾里宁·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冬至 / 贾里宁著.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81126-589-7

I. ①冬… II. ①贾…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1617 号

冬至

策 划 人: 贾曲浪
著 者: 贾里宁

责任编辑: 滕 芸
装帧、版式设计: 罗泽平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四川荣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589-7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5981027

作者温馨提示: 本书少量图片未能找到著作权人, 望著作权人看见后请与作者联系。

我的前半生潦倒跌宕，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过着正常人的日子，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领导下逐渐地进入了理智时代。邓小平的理论奠定了治国方针，反对过去的『假大空』，使我能静下心来写点我经历的往事。目的是想从这些真实的往事中得到一些教训，过去的一些极『左』路线造成的悲剧千万不能重演。

司马迁说过：『不虚美，不隐恶，千秋功过后人评。』我只希望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实事求是地、不夸大、不缩小、努力地做得文尽其实，原汤原汁地把它记录下来。

一个人在历史的长河里，沧海一粟渺小得很。但作为个体来说，毕竟是长久的几十年，是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在这条路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让人歌颂；有的人让人唾骂；有的人活得有滋有味；有的人活得万般无奈。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终是要被历史的长河淹没得销声匿迹。



岁月的陈酿

戴明贤

一九八六年，有几位黔籍学生从北京和其他省份几所美术院校毕业回贵阳，贵阳书画院希望其中有人愿意来充实阵容。两位画家受命去游说，虽未得遂愿，却与他们结下友情。一两年后，他们告诉我一条新闻：那批青年画家中的贾鹃丽的母亲是一位医院退休的老太太，七十二岁开始无师自通画油画，而且一画就很好。我听了很惊喜，老来学国画者不少，老来自学油画的没听说过，这必是一位奇人。真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人海中藏龙卧虎。可惜那时他们已经去拜访过了，答应找机会再带我去。后来各忙各的，就淡忘了。

去年，贾鹃丽女士在贵阳举办母女俩的画展，展名很感动人，叫“在一起”。我这才亲眼见到翟惠民老人的油画，上距闻名已二十多年，老人也谢世已久了。我与同观的儿子儿媳都非常喜欢老人的画。那股天真浑朴、宛若天籁的魅力，令我在好些幅画前久久驻足，离开又返回。满心欢喜赞叹，又不知该如何言说，有点类似听“青歌赛”上那些原生态民歌时的感觉。浏览西方画册，见颇有摹拟儿童稚拙趣味的作品和画家，但总难免流露出成人学小孩的痕迹。而翟惠民老人的稚拙味却是自然浑然、越玩味越有味的。老人自述，曾经埋怨女儿是油画教师，偏偏不肯教她，任她随心所欲地画。后来才悟出，女儿是不愿桎梏了自己。这种卓识，难能可贵。我们的文学艺术，确乎普遍存在“方法”太多，窒碍灵性的现象。女儿鹃丽女士久寓巴黎，已是欧陆知名的画家，她用沉厚的油画力量来表现空灵清雅的中国情韵，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如诗如歌，如读温飞卿词。我想，如果用这种风格画一套屈原的瑰丽诗篇《九歌》，必能不让前人，独具异彩。

以上，似乎讲了些与这本《冬至》无关的事。当然不是这样。本书的作者贾里宁先生，就是翟惠民老人的长子、贾鹃丽女士的大哥。我读这部书稿时，

一再想起她们，觉得艺术之神也太偏爱他家了吧。

《冬至》是一部回忆录，相当完整地纪录了作者从幼年到老年的人生旅程。贾先生生于一九三五年。与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他生于安乐（社会上层人家），长于乱世（抗日战争），服务于折腾（一浪高于一浪的政治运动），老来才得安宁，等到了容许“不虚美，不隐恶”地秉笔直书的时候。我与贾先生是同龄人，经历也大略相近，但远不及他这么曲折多彩；所以读起这部书稿来，既感亲切，又觉新鲜。如他说：“我小时候不懂事，常常惦记着日本飞机来昆明轰炸；每次警报一响，我们就坐上航空学校的汽车，开到有山有水有好风景的乡下‘跑警报’（昆明人的叫法）；于是游山玩水，闲庭信步，颇似今天花钱去旅游。而且家家户户都带上好吃的卤味和干粮，或面包蛋糕，铺在草地上，变成了十足的野炊。”这跟我小时候的情景几乎完全一样。

贾先生拥有超常的好记性。他的记忆好像一个“档案库”，那里面，几十年经历过的事，一件件清晰地收藏着；各个阶段接触过的人，一个个活灵活现地排候着。只待他的笔一调动，就原汁原味地出现在纸上了。记得细，写得活，这是写回忆录的基本条件；记事没有细节，记得细节不能用文字复活，都写不好回忆录。写人更其如此。贾先生既记得细又写得活，二者俱备，只欠动笔，当然一写就精彩。

这绝非过誉之词。请看一例：

马店的客房里燃烧着一座用煤块砌成的“煤灶”，烧得通红，等马车的乘客和等乘客的车夫都围着暖烘烘的煤灶烤着火，谈天说地。

一位穿着蓝布长衫，头上包着帕子的老人低着头抽着长长的烟杆，浓烈的烟雾和呛人的煤气在他的嘴里吞进吐出；突然一阵猛烈的咳嗽，呛得他缩成一团，喘不过气来，我们以为他要昏过去了，正要伸手去扶他时，突然听见他“呸”的一声，一口浓痰吐进了火里，发出吱吱的声音和一股臭气，老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才缓过来，说“鸡场的叶子烟化痰就是好！”

不到二百个字，场景、人物、氛围全出来了。贾先生的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一种若无其事的冷幽默，因而虽然讲的是极普通的事，却往往有弦外之音，很耐玩味。我常常是一边读一边匿笑。

贾先生阅历丰富，又从事基层医务工作，接触到的有趣人物很多，成为书中“一道靓丽的风景”（抄袭记者常用语），文学是人学，是写人的文字，我最喜欢读这些部分。书中人数众多，精彩纷呈，不胜枚举。只以一位李老师为例。此君是寨子里土生土长的人，个头大，力气也大，出身好，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还当过兵，扫过盲，能编对联，能写假条和借条，“这些‘学问’在农村厮混的确绰绰有余。所以他很瞧不起大学毕业生，总说他们五谷不分，连个借条都写不‘撑抖’（写不好的意思）”。他爱乱说乱道，外号“李大炮”，但因成分好，说的又多属插科打诨，虽在政治运动中难免受些小敲打，总的平安无事。其人其行，笑料迭出，特别是语言生动。他年老后膝关节变形，行走吃力，向贾医生这样诉苦：“老贾，老子哪里都好，就是两个轮子不争气，二郎腿都翘不起来，想得到走不到。要是脚上能安上两个像哪吒那样的轮子就好了，出远门车票都不用买。老贾，你给我打听打听，有没有安装这种轮子的地方，老子砸锅卖铁都要买一对。”有一次他偶遇一个劳改释放的旧日学生，交谈中得知其工资比自己高了一大截，想不通，这样发牢骚：“老贾，我悟出个道理：劳改队，劳改队，要劳改才对。我在乡下辛辛苦苦教了这么多年的书，老了老了，退休工资还没有当年被抓去劳改的学生的多，早知道这样，当年我也应该去劳改几年，说不定工资要比现在高得多。”贾先生在普定乡镇工作的时间最长，他能把普定人的语言风格复述得惟妙惟肖。我有不少普定朋友，他们讲话就是这味道。书中这种有趣人物和精彩语言比比皆是。有一位在解放初匪患猖獗时屡立战功的苗族杨县长，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被遣送到农场放牛。有一次在放牛途中与贾医生邂逅，两人边走边聊。杨说：“我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什么都看得清楚，但心里是糊涂的。现在我老了，眼睛看什么都糊涂，但心里却越来越清楚。”我常发现，生活能把

一个常人变为哲人。这位前县长就是一个实例。

读完这些有趣的人和事，也就读出了一个贾里宁先生：睿智，冷隽，明察，善辨，在人海中和光同尘而又超脱其上。

如今，喜爱回忆录之类纪实文字胜过小说等虚构文字的读者，明显地越来越多了。我就是其中一员。《冬至》这本精彩的回忆录，既然我读得津津有味，相信出版之后，一定能让众多的读者读得津津有味。

二〇一三年春分后一日草于适斋晴窗之下

漫漫人生路

魏濂舰

在年近耄耋之年，贾里宁老先生的《冬至》终于成稿付印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在阅读了大量的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后，常常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颇有点“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味道，尽管这个“名”，早就不是功名利禄的“名”，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足印而已。然而这些星星点点的足印，对于浩如烟海的名著、名人之作，有着“众星捧月”之作用，这是客观的，就像每一片绿叶都是不同的一样，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有别于他人，有他自己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故对大家应有高山仰止的谦逊，但也切不可“夜郎自小”。百年之后，当我们儿孙辈研究历史、追溯往昔，固然要循经据典，在名著、在正史中求证，然而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回忆录”之类的文章中，恰恰可以看到真实、真情，恰恰可以“窥豹一斑”，触摸到社会、历史那确实确实跳动的脉搏。也许这就是《冬至》印行和值得流传、存在的原因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作者的贾里宁老先生，并非呼风唤雨之辈，亦非文坛宿将，可舞如椽之笔，其笔触是“小心翼翼”的，是真实的，真实到让你可以嗅到抗战时期炸弹爆炸带来的血腥味，可以走进五六十年代贫困的贵州山区令人难忘的小镇生活，还可以真实地感受到“文革”时期完全扭曲的人性和“被侮辱者”们朴实的情感和爱……

《冬至》是作者人生历程的如实记录，是作者坎坷人生的缩影，同时更是作者伴随我们苦难的民族、多灾多难的国家，历经风雨，终于获得新生的真实写照。作者的人生是坎坷的，但由于他特殊的人生阅历，他的生活之路又是色彩斑斓的，常常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笑过之后你会久久地沉思，眼眶会悄悄地湿润起来。

尽管《冬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回忆录”，有的地方尚不够严谨，或显杂乱，但正因为如此才显得真实感人，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作者出身于杭州的望族，是教科书明确界定的“民族资本家”这一范畴，其生活本来应该是无忧无虑、衣食丰盈的，但在国难当头时，作为一个难民家庭，也像当时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为苟全性命于乱世，从富饶的苏杭大地经湘入黔，再由黔入滇入川，终定居于黔，可谓亡命天涯矣。

作者笔下没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也没有高层当局的颐指气使，只是记录了耳闻目睹的百姓生活。作者亲身经历了日机对萧山、重庆和贵阳的轰炸（其时可能懵懵懂懂），长沙大火等。与其作为国军飞行员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不但目睹了日本飞机轰炸平民的血腥，同时也和农民的孩子嬉戏玩耍，在血腥中度过童年。在当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社会生态环境下，作者记录了国家公务员、抗战伤兵、逃难医生、时髦的房东太太、街上的叫花子及合法或非法的“二奶”们的真实生活。这些“草根”常常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为了一口饭、一块煤吵嚷不休，又常常联手公车私用，发点小小的国难财“共同致富”；有时甚至盗抢国家财产，逃之夭夭；有时互相同情，相互依赖为生。这些场景往往迥异于你看过的电影、小说，更不同于教科书上的高谈阔论。

新中国成立后，作者风华正茂，作为一个中专毕业生，原本应为社会骄子、国家财富，由于历史的和人所共知的原因，却顺理成章地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厄运伴随他度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反右”是一场极为“严肃”的政治运动，在那时的高压下，自杀和精神崩溃者大有人在，作者却以少有的“难得糊涂”坦然面对，活

得卑微而又神色坦然。由于生活在底层，作者细心地观察自己的同事：有趾高气扬，出卖灵魂者；亦有低声下气，唯恐树叶砸破头的许多好人和小城的“风云人物”以及“洋油桶”、“大花鞋”等善良普通之辈。他把他们原生态的普通生活记录下来，让你一下子融入了当年充斥着政治口号、物质生活匮乏的“革命”年代，让人莫名而又发出悠长的叹息。

例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治疗”浮肿病，各地都推广过用甑子来“蒸人”的疗法（今天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其为“桑拿浴”），这本是一出很令祖宗和后人笑话的悲喜剧，在作者的笔下被生动地描绘得“欲哭无泪、欲哭无声”。本来男女有别、严格划分的小蒸房内，十多个脱得精光的女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洗桑拿”，不知什么时候混进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在打开蒸房真相大白时，女人怒斥“老流氓”时肯定会使他羞愧万分，而老者大喊“救命”时却会让你觉得啼笑皆非。这样的真实场景书中还有不少，让你莞尔之余，对那些饥饿的、渺小的人们产生深深的同情。

在《冬至》一书中，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西出阳关》中的许多人和事，我们这一代人（“四〇后”到“六〇后”）是唱着《我们新疆好地方》这首歌曲长大和生活的，至今我们的心中仍憧憬着千里戈壁、大漠落日的雄浑景色，还梦寐以求地单相思着那“达坂城的姑娘”。当你走进贾里宁老先生的《西出阳关》里，你仿佛每时都感觉到黄沙扑面而来，即使是种种光怪陆离的异域风情，也不能让你忘怀在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冬天，帐篷里的一群大男人脱得光溜溜的，围着火炉铁桶坐着，边取暖边烤虱子，还说着无边无际的脏话、笑话。而帐篷的一角，三个年轻漂亮唱豫剧的女演员却缩在被窝里打着寒颤，“同居”一室。最终有两个女演员熬不住了，在逃跑的途中葬身狼腹，她们留下的是被狼群撕碎的、血迹斑斑的衣服和一头乱发，而对此情景你会作何感慨呢？

最近在网上看到“中国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的一段故事。二〇〇五年莫言在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发表即席演讲。说到

“文革”时的人们都变成了“两面人”，在外一副革命造反的派头，越“左”越安全、越保险；回到家里后，把假面具全部卸下，和亲人发牢骚、讲实话，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看了这段故事，让人感慨万分：我们这代人，几乎过了一辈子“两面人”的生活，而贾里宁老先生却总是不习惯于当“两面人”，自然就戴了一顶“右派”帽子，成为历次运动不可缺少的“运动员”，确实是不幸的。但是仔细想起来，贾里宁老先生又是幸运的。在普定这个黔中小县，他能真诚和坦率地直面人生，他长期生活在普普通通“草根”中间，他碰到善良的、诚实的人何其之多；在医院同事中的许多像他那样的被侮辱、被损害者，在仙马村的许多朴实的苗族同胞，在新疆很多流落异乡的流浪者，在后寨烟囱下“牛棚”里的诸多“牛鬼蛇神”，在黄土坡众多的贾幺娘、贾长发，在潘家龙场学校里的许多善良的老师……正是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人物，他们也许是粗俗的，但却是纯真善良的，用他们的心温暖了作者的心，才使作者痛苦卑微的生活蕴育出温馨，生活的幸福指数得以提高和长存，才能跌跌撞撞地走出那个黑暗的年代。

我与贾里宁老先生是朋友、是邻居、是忘年之交，远在半个世纪之前，我还是小学五年级学生时就认识了他。由于我家也是“异乡人”，也属于那个年代被“整治”的对象，似乎“惺惺惜惺惺”，很自然就亲近了起来。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我“上山下乡”当知青后，每当碰到他时，常常会一起针砭时弊、指点江山，直抒胸臆而无所顾忌，成为那个年代少有的几个可以谈心的朋友。

龙飞蛇舞又一年，相信贾里宁老先生会生活得更加惬意，而他的《冬至》会引得大家对往昔的回眸，也会在朋友和读者之间受到欢迎。

二〇一三年春日

目 录

序一：岁月的陈酿	001 / 004
序二：漫漫人生路	005 / 008
远去的童年	001 / 063
冬至	067 / 119
东华山轶事	121 / 126
留在楼梯岩的足迹	129 / 133
西出阳关	135 / 176
马官旧事	177 / 185
烟囱可以作证	186 / 201
龙井春秋	202 / 213
我去到仙马村	214 / 219
潘家龙场和那里的几位老师	221 / 232
黄土坡与贾幺娘	233 / 244
乔老者和他的新媳妇	245 / 250
“大霸王”的故事	251 / 253
卡巴金	254 / 255
稻草人（童话）	256 / 257
母亲与九妹的画展	259 / 266
后记：我所了解的大哥	281

· 远去的童年 ·

一九三五年阴历二月初一，我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一家从事丝绸纺织的家庭，祖父贾汝汉早年就从英国购进了五十台纺织丝绸的电机（纺织机）。那时还是清末民初，纺织机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个新鲜的洋玩意。据说生意如日中天，纺出来的丝绸远销北平、天津、广州和南洋，当年家里人丁兴旺，在杭州算是排得上号的望族人家。

父亲在世时常说，当年我家的厂址就在如今的青春街一带，解放后就在我家废弃的厂址上建成了如今的“杭州市青年文化宫”。

祖父虽是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但心地善良，平时乐善好施，他常常对我的父辈们说：“一个靠刁钻刻薄、心黑手辣发家的人，是利无久享的。做人要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大概的意思是：处事要厚道，不要刻薄别人，一个靠刻薄起家的人家是长久不了的，并要保持朴实的生活和家风，不要刻意地去追名逐利，荣华富贵有时是过眼云烟的事。

回想起来，祖父的家训无形无影地根植于我们这些后辈子孙的骨髓里，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会不知不觉地浮现出来。

祖父在世的时候非常关心邻里的贫困和疾苦，因为他小时候也吃过苦，遭过难，他是从贫困之中拼搏出来的，所以当他发家致富以后，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色。他活着的时候，每到逢年过节，就要嘱咐家人，给整条街的贫困人家和孤寡老人每家每户都要送去两升大米、两斤猪肉和两块银元。他说：“穷人也过年，如果他们过不好年我心里得不到安宁。”



《梦回故园》 母亲翟惠民油画作品

祖父病重的时候把子女都叫到床前来，把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厚厚一摞陈年旧债和欠款借据，当着邻里的面付之一炬，在他过世时整条街的邻里跪成一片为之号啕大哭。出殡之日整条街的邻里都披麻戴孝，一直送至殡葬之地“里西湖”（白堤里面）。

抗日战争使我们一大家人四处逃难，而且常常为一日三餐奔波劳顿，彼此之间失去了联系。

祖父过世四十多年之后，我们的国家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打倒了祸国殃民、人妖颠倒的“四人帮”，开始了“拨乱反正”，经济有了发展，人民有了

自由。我六十多岁的母亲四十多年来一直都在朝思暮想地眷念着老家亲人，想在有生之年回趟老家杭州，去寻根溯源，去寻找家人。

这时我母亲在贵阳结识了一位建工四局的驾驶员吴恃正，是杭州人，他一见我母亲慈眉善眼又有学问，又是同乡，又明辨事理，就一定要做她老人家的干儿子。他说，我们家兄弟姐妹九个人，加上他一个，正好十全十美，一个整数。从此他就融合到我们这个起落跌宕、多灾多难的大家庭里，而且情同手足。在他的帮助下，母亲带着我正在读中学的九妹贾鹃丽回到了故乡去寻找四十多年前的梦。

星转斗移时过境迁，毕竟四十多年过去了，杭州已有很大的变化，几经周折才问到了记忆模糊的“青春街”。因为年代久远，现在的居民大多都是新搬来的住户，所以询问贾家的旧址时都是一问三不知。母亲正在踌躇无奈的时候，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伯伯蹒跚过来，母亲忙迎上去向他打听贾家过去的住址。

这位老伯伯凝目注视了好半天才说：“你是不是当年嫁到贾府家的‘二少奶奶’？当年你身上穿着绛红色絮花的旗袍，脚下踏着高跟的皮鞋，从花轿里下来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你当年多年轻漂亮啊，如今变成了一头白发的老太太了。不过细看起来我还是找到了你当年的影子。你们贾府当年有恩于我们，有恩于这条街的邻里，我们没齿难忘。快、快到我家去坐坐，吃杯家乡的茶（杭州人常常把喝茶说成吃茶）。”

不一会功夫，老伯伯叫来了七八位耄耋老人，他们一个个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来看望当年的二少奶奶。他们拉着我母亲的手，一个个老泪横流，母亲更是泣不成声。

在老街坊老邻居的帮助下，母亲找到了杭州拱振桥“杭丝厂”宿舍，她看见许多小孩子在一块儿玩耍，可能是血缘关系吧，母亲看见其中一个小男孩，一眼认定是我们贾家的人，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我母亲问他是否姓“贾”的时候，小孩子愣住了。

这个男孩就是我堂弟银水的儿子，失散四十多年的骨肉亲人总算找到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的堂哥金水在金华市公安局工作，我的三叔和四叔在解放以后，也定居在那里，我九十八岁高龄的祖母也还健在。母亲在杭州住了几天，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匆匆地去了金华。三叔、四叔和堂兄金水也激动得举家出动，前往火车站迎接我母亲和九妹的到来。



《老家》 母亲霍惠民油画作品

当母亲看见祖母的时候真是悲喜交加，大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四十多年漫长的岁月，常常朝思暮想的骨肉亲人今天就在面前，当祖母听说她的二儿子——我的父亲已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过世的消息时，伤心得声泪俱下号啕痛哭。大家都有千言万语要彼此倾诉……

我出生时祖父已过世多年。后来由于东洋货的冲击，加上祖母不善管理，偌大一份家产交给她老人家乡下来的几位兄弟来照管，自己却成天进庙求佛烧